

郑振铎



文化人影记丛书

郑振铎

郑尔康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郑振铎/郑尔康编著 .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6
(文化人影记丛书)
ISBN 7-5434-4179-9

I . 郑... II . 郑... III . 郑振铎 (1898~1958) - 生平事迹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6295 号

文化人影记丛书
郑振铎
郑尔康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 印张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ISBN 7-5434-4179-9/K·172

序　　言

郑尔康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空，“五四”是个群星升起，璀璨无比的年代。继鲁迅之后，在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文豪大师中，有一位被称为“多面手”（胡愈之语）或“百科全书派”（端木蕻良语）的，同时也是建国后，惟一被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追授为“革命烈士”的著名作家，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郑振铎。

一、作家·学者·“多面手”

胡愈之在一篇悼念郑振铎的文章（《哭振铎》）中写道：郑振铎“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文化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而端木蕻良在《追思》一文中，则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是最卓越的一个。”两位先生的评价，很确切地指出了郑振铎是一位“最卓越的”多才多艺的作家兼学者。

如果仅以创作来衡量一个作家，那么郑振铎写的小说并不

多，但其成就，却是不容忽视的。就目前所知，共三十六篇，除《取火者的逮捕》是长篇外，其它均为短篇。

《家庭的故事》是他早期写的一组家庭系列短篇集，收《猫》和《风波》等十六篇。他以朴实的文字和“几分眷恋”的心情，为读者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作者选取了各个不同的角度，为它“留影”，为读者呈现了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角落。这些故事并不是作者的回忆录，但是这些人物原型，是当时中国社会“到处都可遇到的”，作者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因此下笔得心应手，多数人物形神皆备，有血有肉，是至今仍被人们称道的佳作。

通过《家庭的故事》，作者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的各种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使读者透过这些家庭，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但是，他对这些家庭并没有明显地去谴责，因为他在这里实际上是告诉了读者一个道理，即不合理的社会，是由不合理的家庭所组成；而实际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是直接或间接造成这些家庭悲剧的根源。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作者的这种观点，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社会意义。

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渊博的学识，逐步形成了郑振铎擅长的



一九三四年的郑振铎

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创作特色。三十年代中后期，他先后创作了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长篇《取火者的逮捕》和以文天祥、阮大铖、黄公俊的事迹为题材的《桂公塘》、《毁灭》、《黄公俊的最后》等三个短篇。前者虽然写的是外国神话，实际上是“借古喻今”，以达到他鞭挞蒋家王朝的昏聩、丑恶和残暴的目的；同时预示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将取得胜利。用他自己在该书《新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桂公塘》等三个短篇，同样也并非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之作，而是感于时局所写。当时，正是抗战烽火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之际，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使“东三省”等大片国土沦落日寇铁蹄之下。他通过这些作品，宣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唤起民众来共赴国难，并着重表现了文天祥、黄公俊的凛然正气和百折不挠的抗敌壮志；通过阮大铖等反面形象，影射了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作品忠于史实，故事情节感人，作者紧扣了时代的脉搏，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灵，使这些作品成为一代佳作，流传至今。

郑振铎的诗写得也不多，但其中不乏佳作。早期的一首《我是少年》，充满着青春活力，焕发着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在青少年中传诵一时，并被灌制了唱片，唱遍大江南北。

抗战初期，是他写诗的高潮。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件的



海 一九三四年底，郑振铎重返上
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



一九四〇年，“蛰居”上海期间的郑振铎

“真率”，反对“雕琢与粉饰”，作者强烈真挚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斗争精神，时时都感动和鼓舞着读者。

郑振铎还有很多抒情性很强的散文，如《海燕》、《离别》等；而作为一位学者，他还写作了大量学术性很强的散文；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还写了许多笔锋犀利，针砭时弊的杂文（广义的讲，也是散文）。总的讲，在他生前，大约出了六七种散文集；建国后，又有不少他的散文结集出版，可见他的散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限于篇幅，就恕不详述了。

一个多月里，他以火一般炽烈的语言，写下了《卢沟桥》、《回击》、《祈战死》等数十首斗志昂扬、壮怀激烈的诗篇，表达了这位爱国诗人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后来，他以“战号”为名，选了其中的十几首和“五卅”及“一二八”时期的诗，合编作一个集子“贡献给一切抗战的战士们”。

郑振铎还是一位散文大家。坚持“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他的散文写作中，是颇具特色的。他最初的几篇反映“五卅”的散文《街血洗去后》和《迂缓与麻木》等，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些散文中，作者的创作倾向力求

作为学者，文学史是他的扛鼎之作。在三十年代，他先后推出的三部文学史——《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当是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重大建设性贡献。前二者均以在史料的挖掘上和精辟独到的见解，以及大量精美名贵的插图而赢得众多的读者，被公认为是建国前最好的一部文学史专著。而《中国俗文学史》虽然由于当时抗战的局势，未能配插图，但它对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俗文学”定义和论述，都作出了重大的理论性突破，至今尚没有一部同类著作可以取代它。

此外，郑振铎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开拓作用，和他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值得专题探讨的。而作为一位“多面手”的学者，他的治学领域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在历史、文物考古乃至版本学、目录学、古代艺术史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并也有很多书籍出版。他编著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包括《中国古代木刻史略》），前些年曾得到了中日艺术交流中心和莱比锡图书博览会的两个金奖。种种的以上所述，限于篇幅就不在此一一介绍了。据专家的粗略统计，郑振铎不足六十岁便英年早逝的一生，发表的各类文章（单篇），约有二千多篇，而据最近出版的他的——并不十分完整——全集统计，总字数近一千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二、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和优秀的编辑

郑振铎不仅是学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文学活动家。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只是一名铁路专科的学生，就和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了当时最大的进步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的现实主义

文学主张。在该会的成立过程中，他是最早的实际发起者，并也是出力最多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他的周围，团结了茅盾、叶圣陶等一大批进步作家，曾被人称为当时文坛的一面“帅旗”。同时，他还是三十年代“左联”的前身“中国著作者协会”和后来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他还曾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和暨南大学文学研究会的领导者。抗战爆发后，他又是“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战时



一九五八年出国前夕

“文艺家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抗战胜利后，他以“全国文协”成员的身份，主持了“文艺节”、“诗人节”。在这些活动中，郑振铎都充分展现了他超群的组织才华和过人的活动能力。

作家和编辑始终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我国许多现代著名的作家也都是优秀的编辑（有的就是由编辑出身的）。郑振铎的一生，始终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精力过人、敬业、严谨的编辑。他在学生时代，就和瞿秋白等人创办了政治性刊物《新社会》；以后又主编过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新文化运动中，他继茅盾之后，主编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长达十年；全国解放前夕，他还是当时上海的三大进步政治刊物之一的《民主》的主编（另两种是《文萃》和《周报》）。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如《小说月报》）曾一度在全国文坛占据重要地位。据专家（陈福康先生）的“粗略”的统计，他一生主编与参与编辑的报刊达四十四种，还不算他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丛书和艺术、历史图籍等。并且，这些编辑活动，都是和他的著书立说以及文学活动同步进行的，以一个人的能力，这该又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三、爱国者的一生

郑振铎生活的年代，是个动荡和战乱频仍的年代。从“五四”一直到全国解放的三十多年里，在所有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他不算是最先进的，但始终是个真诚的爱国者，是个坚强的战士。

观其亮灿灿的一生，从“五四”时期的一名学生领袖，与

瞿秋白并肩战斗到商务印书馆大工潮中的工人代表；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政权组织成员到“四·一二”后，领头向反动当局写信强烈抗议；从“五卅”惨案发生后，创办《公理日报》，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到抗战时期坚守“孤岛”，与张元济等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文献，到解放前夕，主编《民主》周刊，呼吁反内战、反独裁，到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为“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而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都说明他在任何时代都是站在潮流前列的。

郑振铎是在一次执行党和政府委派给他的率团出访任务中，因飞机突然爆炸而壮烈地结束了一生的。他的一生，把一颗火热的心奉献给他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最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肉体化成一团烈火，消失在永恒的宇宙中。

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过贡献的人，大家是不会忘记他的。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给我这样的机会，通过几十幅退了色的老照片，来向广大读者介绍先父郑振铎，这个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人。限于篇幅，很难把他一生的辉煌都浓缩到这本小书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希读者谅解！



美丽的温州市区一隅

“出生在温州的福建人”

瓯江——浙江的第二大江，两岸峰峦叠翠，景色绮丽。在它流入东海处的南岸，镶嵌着一颗明珠——温州。温州历史悠久，由于气候温暖，所以从唐代起，就一直叫温州。它东临东海，北濒瓯江，江海相连，历史上是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贸易港口，浙东南的木材、茶叶、麻、柑橘、生猪等都在这里集散。农业、纺织、造纸、造船及漆器、刺绣等手工业都曾居全国前列。

钟灵毓秀、丰腴富饶的温州大地，抚育了代代风流人物。从汉时东瓯王驺摇到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考古学家夏鼐、“一代词宗”夏承焘……历代英杰辈出，文风鼎盛。



福建长乐县首占村义福房——郑振铎祖居

一八九八年，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初七），本书主人公郑振铎就诞生在这座小城里乘凉桥下的一座叫做“盐公堂”（一说“炮丁”）的古老宅院里。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县首占村，全村皆为郑姓，郑振铎这一房从用辈至允辈曾出了五个进士，是当地望族。他的上辈高祖郑用苍，进士出身，曾任山东盐运使，领按



温州的江心屿

察使衔，二品顶戴；曾祖宏博，是贡生，授瓯宁学训导修职郎，曾祖母是湖北巡抚柏荫的女儿；祖父允屏，跟随一个在浙江任道台的表亲当幕僚。此时，他的家道已中落，祖父只身从长乐来到温州任职。当道台的表亲有意照拂，多次委任他为海防官吏及税官、盐官一类的差事，虽只是个从九品的芝麻小官，倒也算是肥差，于是，几年后便把家眷都由长乐接到温州定居了下来。因此郑振铎在他的一篇自白中说道：“我是出身在温州的福建人。”

温州江心古塔是郑振铎儿时最爱去游玩的地方



伟大的母爱

郑振铎七八岁时，父亲及祖父相继亡故，从此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依靠母亲郭氏做些瓯绣或帮人家做针黹、端午节时缝制些布老虎拿去卖，来维持清贫的生活，他才勉强读完了小学、中学。

少年时代的郑振铎，长年穿着不合体的衣衫，患慢性鼻炎久治不愈，两行鼻涕常常不由自主地从鼻孔中挂下来。同学们嘲笑他，看不起他，给他起了个“鼻涕佛”的外号。多数同学都不和他玩，只有夏承焘成了他的知己。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大家在玩时，他总是独自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读书；只有夏承焘有时硬拉着他一起去池塘边捞蝌蚪或是去古坟堆里逮蟋蟀，这时，他又像是个孩子，脸上暂时浮现出一丝微笑。

夜间，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坐在油灯前做着针线，郑振铎便偎依在她怀里，听她讲许多流传在福建家乡的民间故事，或轻声唱着家乡的动听的民谣。听着听着，他便在慈母怀里进入梦乡，脸上含着幸福的微笑。母爱，多么温柔，多么伟大，那比蜜还要浓郁甜美，令人心醉的母爱啊！

郑振铎，这个瓯江边上的“丑小鸭”，在慈母的精心呵护下，以一股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顽强精神，刻苦读书，一天天地成长起来。



郑振铎的母亲郭氏

未来的站长

一九一七年夏天，郑振铎辞别了慈母，第一次独自远离抚养他近二十个春秋的瓯江，乘船北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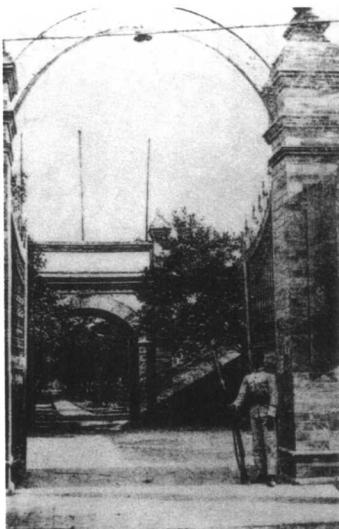
到北京后，他寄住在东城根西石槽胡同六号叔父郑莲蕃家。一走出北京南站，他这个在小城镇长大的青年，就被车水马龙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要不是三叔雇了马车来接他，他简直真不知东西南北了。

三叔对他很和气，但一谈到投考北大中文系，在外交部任主事，收入不菲的三叔脸上却显露出难色，于是他便不再提此事，因为他知道，文科大学的学费是比较昂贵的。

转过年便是一九一八年了。一月十四日那天，在北京西城李阁老胡同的一座旧式大院内，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天正是铁路管理学校英文高等班新生报到的日子。郑振铎

身穿一件灰布旧棉袍夹在一群青年人中。自从三叔不赞成他投考北大后，经再三选择，最后选定了投考这座交通部所属的学校。因为它一则学费低，是半官费；二则将来毕业后，职业可以有保障。尽管这与他的本愿相去甚远，他决不想在铁路上干一辈子，但由于当时的处境，出此下策也是万般无奈。

鄭振鐸曾就讀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





和铁路管理学校同学们合影（右一为郑振铎）

铁路学校的学习是很艰苦的，学校不安排住宿，他每天黎明即起，然后从东城根步行近两个小时，到西城去上课。三叔每天只给他两三个铜子儿日用，为了省下钱来买书，他从来不吃早餐，中午也是常以大饼或烤白薯充饥。

学校要学的课程很多，除了铁路工程、测量、铁路应用等课外，还要学电报、会计、国文和英俄两门外语。一天六节课下来已是头晕脑涨、饥肠辘辘了，然后他还要花掉近

两个小时的时间走回东城根。春秋季的日子倒还好过些；

一到冬天，北风刺骨，他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袍，里面贴身仍穿着夏天的单衫，身上凉，肚内饥，用“饥寒交迫”来形容，毫不夸张。一天，一位老校工拍拍这位能吃苦耐劳的年轻人的肩膀说道：“好好学吧，小伙子！将来你们都是站长。”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纪念册上的
郑振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郑
振铎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